

【统战问题】

论西安事变的三个问题

侯新养,刘兰英

(长安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导者;中国共产党并非是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调停者;蒋介石也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中国共产党;蒋介石

中图分类号:K2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4)04-0080-04

Study three problems about the Xi'an Incident

HOU Xin-yang, LIU Lan-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Xi'an Incident is an important affair in the modern period of China. The ZHANG and YANG is the predominant factors of pacific settlement of Xi'an Inciden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not a mediator or mediator between ZHANG Xue-liang, YANG Hu-cheng and JIANG Jie-shi, JIANG Jie-shi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of pacific settlement of Xi'an Incident.

Key words: the Xi'an Incident; ZHANG Xue-liang; YANG Hu-che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JIANG Jie-shi

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导者和决定性因素

1936年爆发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它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可以说是当时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到底是哪种因素、哪些方面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目前学术界是见仁见智,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性因素”。^[1]笔者觉得这种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诚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确实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毕竟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从事变的酝酿、发动直到和平解决,他们一直起着主导作用。所以,笔者认为张、杨才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决定性因素。

首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的初衷和目的就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准备了前提条件。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兵谏”的形式逼蒋抗日,促其反省,但是前提是要保其安全。事变之前,他们一再叮嘱部下,一定要捉个活的蒋介石,不能打死他。张、杨在不同场合一再表白其捉蒋的目的,事变次日发表的“张学良、杨虎城等对时局的通电”说:“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2]使其接受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同日,张学良在对总部全体职工的“训词”中更明确地说:“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另外,张、杨在给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的电报中也一再强调:“促其反省,决不安加危害”,“因请蒋公暂留西安,保障一切安全,以

收稿日期:2004-06-15

作者简介:侯新养(1962-),男,陕西蓝田人,长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便反省”,“暂留西安,以待觉悟”,^[2]“对介公个人,仍当极力爱护,不成问题”。^[2]整个事变过程中,张、杨都把蒋介石的安全问题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采取各种措施保其人身安全,最后使蒋得以从西安安全返宁,这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基础和前提。否则,和平解决将成为一句空话。

其次,张、杨是西安事变的领导者,中共的主张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实现。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张、杨是“西安事变的领导者”。^[3]从事变的发动指挥,提出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到同宋氏兄妹及蒋介石的谈判,直至送蒋回京,他们二人都处在一线,起着主导作用,是整个事变的决策者。而中共虽然也提出了自己解决西安事变的具有建设性的方针政策,而且也参与了和解的整个过程,但是中共的主张并不能靠自己独立地去实现,而必须通过张、杨才能发挥作用,这也就决定了中共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虽然作用很大,但总体而言还是起着支持和帮助的作用,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主要还是张、杨发挥主导性作用的结果。

第三,张、杨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发展前途是有计划、有准备的。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心血来潮,一时冲动,捉蒋后束手无策,甚至在事变爆发后提出的八项主张中亦无“和平解决”的字眼,故其对事变的前途毫无计划,笔者认为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恰恰相反,张、杨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事变前后,他们一再表示,其发动西安事变是因为不满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只要蒋能联共抗日,仍拥戴他为领袖;事变伊始,张、杨就在为变变的最后和平解决做着准备。捉蒋时他们就命令部下要捉一个活的蒋介石,“不准伤害”,“绝对不能把他打死”。捉蒋回到西安后,又及时将其转移到安全舒适的高桂滋别墅。事变次日,张、杨在对时局的通电中提出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2]这八项主张可以说是张、杨发动“兵谏”的宗旨和目标,是他们后来同宋氏兄妹谈判的蓝本,其中虽未有“和平解决”的字句,但其中明显蕴含着和平解决的思想。同时,张学良致电南京政府要员孔祥熙等,暗示他们协助调解,孔认为这是“明予吾人以谈判之机”。1936年12月14日张见蒋时表示,只要实行八项主张中的几

条,即可送蒋回京。此外,张、杨还多次电邀南京政府和各地方实力派,希望他们派代表来西安共同协商政治解决。所有这些都说明,张、杨从一开始即进行着和平解决事变的努力,并且是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着。

第四,送蒋返宁是张学良自己独立决定的。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关键取决于蒋介石能否答应张、杨联共抗日的要求,以及由此决定的蒋介石能否离开西安回到南京,在这个关键环节上,张学良以“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气概,在当时那种复杂多变的局势下,不顾个人安危,做出了独身一人送蒋回京的果敢之举,以实际行动实现他当初发动“兵谏”的动机和目的。假如没有张学良的这一义举,西安事变还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张学良以他个人的巨大牺牲,换取了和平解决的重大成果,这其中虽然夹杂着一些鲁莽和义气的成份,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独立决定、亲自送蒋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起的特殊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12月15日张汉卿送蒋回南京之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还不知弄到何种地步。”^[2]由此可见,张学良送蒋返宁这个环节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

总之,不管是从西安事变发动的目的动机,还是事变后的军政措施,以至送蒋返宁之举来看,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都起着主导作用,是决定性因素。而中共以大局为重,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高度,捐弃前嫌,“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就曾说过:“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做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3]这正是中共的英明正确之策。

二、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西安事变爆发后各种政治力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到底充当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对此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共是西安事变的调停者,“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是‘调停’宁陕双方的矛盾冲突,实现国内和平”,“特别是在张、杨和蒋之间进行调停,以平息争端,团结抗日”,“红军代表团是陕宁双方中间的调停者”。^[4]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悖于历史事实。众所周知,作为一个调停者,首先应具备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即他必须和被调停的双方都有良好关系,没有任何矛盾,威

望较高,能为双方认可和接受。而中共恰恰不具备这个条件,因为中共和矛盾的一方蒋介石长期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两者有着不共戴天之仇。蒋介石此时也担心自己一旦落入共产党之手,必死无疑,以致他得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后,辗转难眠,夜不能寐。特别是在他成为阶下囚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极强的戒备心理和对抗思想,不可能认同昔日的对手中共居间调解,从而也使中共调停者的角色难以实现。

实际上中共一开始也并不是以调停者的姿态出现的,对蒋介石的态度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事变爆发之初,中共的态度比较激进,认为蒋介石“虽百死也不足赎其罪于万一”,主张押蒋到保安,交由全国人民公审。直到1936年12月18日中共代表团进驻西安,其对蒋政策才发生了明显变化,即不再要求严惩蒋氏,应保蒋安全。综观中共参预解决西安事变的全过程,我们发现中共所做的主要工作并不是什么调停,而所有的工作基本上都用在帮助和支持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上,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政治、军事上给张、杨予以支持。事变爆发伊始,中共就明确表示对张、杨的行动给予肯定,并迅速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亲赴西安进行协助。1936年12月15日和19日,中共分别致电南京政府和全国人民,在道义上给他们予以支持。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后,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更加坚定了他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信心和决心。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高屋建瓴,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为西安事变的发展指明了前途,使张、杨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认识趋于一致,从而为西安事变的最后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在军事上,事变爆发后,红军立即南下,向东北军和西北军靠拢,予以声援。在中共代表团赴西安的同时,彭德怀率红军进入甘泉至淳化、三原一带,12月18日进驻延安,以便南下渭北支援东北军。中共还指示红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打击,促其反省”^[2]制止内乱。叶剑英在随代表团到达西安后还专门协助张、杨主持军事。

第二,说服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要以大局为重,不要冲动,确保蒋介石的人身安全。事变之初,在蒋介石被扣后如何处置的问题上,许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群情激奋,感情冲动,游行示威,要求立即公审处死蒋介石,甚至采取了暗杀行动。所以这时蒋介石的人身安全就显得极为重要,如果稍有闪失,就极易酿成全国内乱,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期望看到的。

中共代表团分别深入到各级官兵中,以中共过去与蒋介石有血海深仇,如今亦主张和解的事实为例,晓以大义,耐心说服,使得许多壮派官兵冷静下来,回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轨道,为事变的最后和平解决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第三,协助张、杨说服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周恩来到西安来就是要说服蒋介石接受张、杨提出的联共抗日的救国主张,宋子文刚从南京来到西安,周恩来就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向他表明了中共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希望他也说服蒋介石团结抗日。1936年12月23日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了六项主张,双方在此基础上经过实质性接触,第二天就达成六项协议。24日周恩来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下,亲自会晤了蒋介石,蒋被他的诚意所感化,当即答应“与共产党联合抗日”。

第四,帮助张、杨处理善后工作。张学良送蒋回京被扣留后,西安方面出现了极为混乱的局面,特别是东北军内部由于群龙无首,发生分裂,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十分激烈,最后酿成老将军王以哲遭枪杀的“二·二”事件。面对这种复杂情况,杨虎城束手无策,力不从心,难以控制。周恩来深入到东北军官兵中去,进行艰苦细致的说服工作,逐渐平息了内乱,稳定了局势,避免了更大范围的自相残杀。同时,中共中央还调动红军协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加强防御,告诫他们保持冷静,千万不可自乱阵角,互相为敌。这样就使得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果得以巩固。

总之,我们从以上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所做的主要工作可以看出,在整个西安事变中,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站在中间者的立场上去刻意调解双方的矛盾,而是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高度,以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积极参与、帮助支持张、杨实现逼蒋抗日的主张上,最终使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得以实现。所以中共并不是宁陕之间的调停者,如果说中共在其中起了一些调停作用的话,那也是在张、杨之间,如曾参与调解西安事变的重要当事人之一的端纳就曾说过:“周恩来起了张、杨间调解者的作用。”^[5]那种认为中共是西安事变中张、杨与蒋介石之间调停者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蒋介石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西安事变爆发以后,各种进步势力纷纷站出来奔走呼号。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张、杨二将军

力持和平,宋氏兄妹及端纳力主政治解决,他们分别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为西安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但是,西安事变中最主要的人物之一,也是事变的引起人和主要当事人蒋介石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却很少有人论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漏。因为他作为主要当事人,如果不起任何作用,没有任何作为,要想离开西安回到南京,进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都将是一句空话。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因政见不一而发生的一场兵谏,是他们之间长期以来矛盾的总爆发。他们是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当事人。西安事变如何发展?能否和平解决?这关键取决于他们双方的态度取向,从一定意义上讲更取决于蒋介石能否答应张、杨提出的条件,所以蒋介石的态度问题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就显得尤其重要。张、杨发动“兵谏”的目的就是要促蒋反省,逼蒋抗日,但若蒋介石顽固不化,不转变态度,不改变政策,不答应他们的抗日要求,使其“兵谏”的目的不能实现,那么谈判就可能无法进行,张学良就不可能很快送蒋回京,和平结局也就难以实现。对这一点张、杨也曾曾在不同场合做过多次表露,早在12月12日发兵捉蒋时张学良就对杨虎城说:“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到南京。”捉蒋后他们多次强调,只要蒋介石“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我们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2]因此,蒋介石能否转变态度,能否把过去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转变为联共抗日政策,就成为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的关键,对此,事变的主要参与者之一端纳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和蒋先生个人的安危荣辱,就系于蒋先生个人的一念。”^[6]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

事变之初,蒋介石并未了解张、杨发动事变的真实意图,对抗情绪十分严重。端纳和二宋来到西安告知他张、杨并无加害之意,只要求他团结抗日。当他又得知南京方面“戏中有戏”,欲置他于死地后,遂改变对立态度,并于12月17日手谕南京暂停进攻,制止了何应钦对西安的轰炸,这样一来就使西安事变有了一个比较和平的外部环境,使得张、杨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从容地处理棘手问题,从而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蒋介石还委托宋氏兄妹全权代表他进行谈判,最后在六项主张的基础上达成协议,答应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正是因

为蒋介石做了一定程度的让步,西安事变才取得了初步成果,张学良送蒋返京也才成为可能。可以说,如果没有蒋介石的自我反省,没有他态度的转变和让步,那么和谈就难以进行,张、杨的主张就难以实现,事变的和平解决也就难以实现。

当然,蒋介石是站在代表英美利益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他的态度以及政策的转变不是主动和情愿的,而是被迫的,是形势使然。蒋介石当时是“身陷囹圄”,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尽管他装出一副死不足惜的样子,告诉张学良,要不“你马上把我送走,否则,任凭你办好了”,并电告宋美龄:“余决心殉国。”^[7]但他是不会轻易退出政治舞台的,他深知形势的险恶及宁陕对立的后果,被迫对自己过去的政策加以反省,再加上张、杨,中共、宋氏兄妹以及端纳等各方面的逼迫、敦促和劝告,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态度,暂时作出一定的让步,答应张、杨的抗日要求,从而换取自己的平安返宁,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铺平了道路,也成了时局转换和国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枢纽。

蒋介石态度的转变,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必要条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他作出了明智的选择,是应该肯定的。正如当时的《红色中华报》所说:“蒋介石之反省而被释放,正是全国人民的期望与全国爱国将士与人民共同努力于停止内战所致”,“蒋介石毅然接受西安方面之抗日救国要求,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继续与蒋合作,均是为大局着想的勇敢的行为。”^[2]

参考文献:

- [1] 季云飞.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诸因素作用评估[J]. 求索, 1996, (4).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 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Z].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 [3]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0.
- [4] 房成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原因新论[A]. 王星昌. 中国革命史专题研究[C].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 [5] 李林. 端纳在菲律宾对记者的谈话[N]. 纽约时报, 1945-02-28.
- [6] 陈济康, 戚厚杰. 蒋介石的洋顾问[M]. 北京:华文出版社, 1995.
- [7] 应德田.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M].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责任编辑 陈志和]